

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 二次大戰期間的 重要片斷

著—— 鄺智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

本文部份資料由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提供，特此鳴謝。
本文承蒙張少強教授及蔡耀倫先生提供寶貴意見，作者衷心致謝。

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

鄺智文 著

發行：HKSC X jcMotion@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主編：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編輯：張嘉輝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在於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拔弩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3 (鄺智文).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鄺智文 (2013)。 *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 [電子版]。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張嘉輝（主編）。香港：jcMotion。取自<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 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¹

鄭智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

摘要

從1841到1997年，香港是英國在亞洲的一大軍事據點，與此相關的香港軍事史研究卻一直付之闕如。一般香港通史只按照香港屬於商業與貿易中心來記述殖民時期的香港故事。若有觸及軍事一環，往往限於列出砲臺等防禦性的「海防」設施。由這套歷史論述延伸出來的常見史識認為：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以前，英國已疏於香港防衛，直至1930年代中期日本侵華之時，方告急忙修築「醉酒灣防線」充當防禦工事。可是，英國居然即時充滿自信，揚言當時的香港足以禦敵達半年之久。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前夕，英國又僅在該年年底倉卒派遣缺乏經驗的加拿大軍到港增援，在過度自我高估之下，落得迅速潰敗的慘淡收場。為何香港的歷史論述往往只有如此簡單的軍事記述？這套歷史論述如何出現？它何以能夠極為流行？其流行又有何知識/權力作用？本文試作說明，透過翻查檔

1 本文部份資料由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提供，特此鳴謝。
本文承蒙張少強教授及蔡耀倫先生提供寶貴意見，作者衷心致謝。

案史料，勾出長期都被埋藏或忽視的重要片斷，重繪香港在二次大戰期間的軍事史，並反思殖民年代英國對香港的價值評估及管治追求。

關鍵詞：香港故事、軍事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論述、檔案史料

前言

自法蘇（Paul Fussell）在1975年出版《一次大戰與現代記憶》以後，探討戰爭記憶成為「軍事與社會」（War and Society）學派的其中一個研究焦點。一直以來，戰爭都是建構「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重要參照，尤其是參與者眾或曠日持久的現代戰爭。正如軍事史家尼堡（Michael Neiberg）指出，有關戰爭記憶的歷史書寫，其誕生及論述總會受到社會傾向所支配，並按特定目的進行編纂（Neiberg, 2006: 54-55）。如兩次世界大戰等近代戰爭，對塑造加拿大、澳紐、土耳其、以及中國等國家的自身歷史論述，以及由此而來的族群想像，就有決定作用。如何紀念（或遺忘）戰爭，對國家如何統領軍隊及連繫人民舉足輕重。由中國官方主導的近代史學甚至提出「百年國恥」之說以統稱中國在1842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長期戰亂，並藉此扣連當代華人的身份認同及世界觀（Wang, 2012）。

相比之下，香港的歷史論述較少重視軍事對香港發展的影響，反而偏重香港只屬商業與貿易中心來記述殖民時期的香港故事。若有觸及軍事一環，亦只限於列出防禦性的「海防」設施，如海岸砲臺的興築過程。由這套歷史論述延伸出來的常見

史識認為：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伊始，英國已然疏於香港防衛，直至1930年代中期日本侵華之時，方告急忙修築「醉酒灣防線」充當防禦工事。可是，英國居然即時充滿自信起來，揚言當時的香港足以禦敵達半年之久。1941年，日軍即將進攻香港，英國又僅在該年年底倉卒派遣缺乏經驗的加拿大軍到港增援，在過度自我高估之下，落得迅速潰敗的慘淡收場。這套歷史論述當然並非毫無依據，但其建構有忽略其他重要細節之虞，甚或於有意無意之間略去足以挑戰這套歷史論述的資料²。因而，這套歷史論述在披露歷史實情的同時，也反過來隱藏了歷史實情（Cheung, 2012）。有見及此，本文將對現有的香港軍事史論述作出批判修正，指出這套歷史論述如何受到作者背景、描寫對象、史料選材、政治立場，以至權力關係所限，導致香港整體的歷史想像普遍存在「去軍事化」的記述傾向。透過現存英國、日本、美國等地的官方檔案資料，本文亦會重新列舉在二次大戰時期，英國在香港曾經作出的戰略部署，就香港的歷史論述何以總是諷刺地延續一套缺乏戰略詳情的軍事史記述，提供另翼探討。

2 這問題在香港歷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亦有出現。就這方面的批判，見：Chan Wai Kwan (1989)、Ngo Tak Wing (1999)、蔡榮芳 (2001)、張少強 (2012) 的相關研究。

一. 誰寫，何時寫，為誰寫？

香港在殖民時期的軍事歷史是英國海、陸、空三軍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故此，香港軍事史的編纂者多為英人，既以前駐港英軍為主，亦有半官方的英國作者。這些歷史著作多以特定兵種為記述主題，撰寫時間多為該兵種減少駐港部隊或完全撤離之時。例如，由Gordon Alderson撰寫，於1972出版的《皇家空軍啟德基地史》即以兵種為主體，出版時亦是啟德機場只剩下皇家空軍第28中隊（28th Squadron）的直昇機隊駐紮，即幾近全面撤出的時刻³。相類案例還包括由本為砲兵的羅路（Dennis Rollo）撰寫，於1991年出版的《香港火砲和砲兵》，現為認識香港海防砲兵和砲臺的主要參考著作⁴，以及由前駐港英軍副參謀長梅森准將（Commodore Peter Melson）撰寫，於1997年出版的《白艦旗、紅巨龍》，旨在記述駐港皇家海軍歷史的一部專著⁵。

3 Gordon Alderson, *History of Royal Air Force Kai Tak* (Hong Kong: Royal Air Force Kai Tak, 1972), p. 100.

4 Denis Rollo, *The Guns and Gunne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Gunners' Roll of Hong Kong, 1991).

5 Peter Melson, *White Ensign - Red Drago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in Hong Kong, 1841-1997* (Hong Kong: Edinburgh Financial Publishing (Asia), 1997); Kathleen Harland, *The Royal Navy in Hong Kong, 1841-1980* (Hong Kong: Royal Navy 1981).

這些著作的描寫對象多為曾經服役於香港的英聯邦軍人，內容也多以紀念或掌故為主，對特定兵種的組成、裝備及設施駐，或對駐軍的生活、習慣、文化及共同記憶均有詳細記載，小如自戰前開始，已為駐港英國艦隻清潔船身，命為「珍妮小隊」（Jenny's Side Party）的一群水上人婦女，也不遺漏（Melson, 1997: 115-118）。它們如此細說駐港英軍的見聞及生活，對研究香港軍事歷史確有重要貢獻。可是，這些著作對香港的整體歷史環境、戰略地位及防務政策一般都著墨不多。這些著作往往亦受限於作者大多不是史學專家，其書寫旨趣並無正規歷史編纂的學術追求，也乏嚴謹處理史料的經驗，因此多以記述逸事為主，並以殖民者的自身觀點來書寫這些逸事。由他們撰寫的著作也有部份以軍事為書寫重點，但其歷史視線仍鮮有觀察個體以外或地方以上的層面。如奧林西（Oliver Lindsay）的《香港戰役》⁶和布東尼（Tony Banham）的《毫無機會：1941年香港保衛戰》⁷，即從英聯邦部隊的角度，對日軍攻港期間的戰事，以日誌方式進行仔細記述，但卻同樣少有觸及整體的歷史環境、戰略部署及防務政策。反而，孫福林（Philip Snow）的《香港淪陷》則嘗試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來理解香港社會所受的整體衝擊，可是這種著作至今仍屬少數⁸。

6 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stage to Fortun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二. 歷史論述與檔案資料的差別： 兩次大戰期間的香港防務

香港的軍事史研究所以普遍缺乏整體分析往往由於忽視官方檔案所致。儘管檔案研究乃歷史學的專長，可是香港的軍事史研究卻較少使用政府檔案，如：英國陸軍部（War Office）、參謀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及帝國國防委員會（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等機構在1941年以前有關香港防務的官方紀錄都甚少被引用⁹。因此，論者多以外部環境推斷英國政府對香港防衛的態度和政策，由此得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基於開支考慮，自1920年代初即把戰略重心轉到新加坡，只留下少量駐軍在港之結論，使英國在兩次大戰期間「放棄」香港一說盛行至今，成為大部份香港軍事史研究的基調，用以說明英國一直疏於香港防務，或解釋日本攻港之時守軍迅速戰敗的原因。就連部分具正規學術體例的史學著作亦不例外。加拿大人卡爾文森（Carl Vincent）在他頗有影響力的《無解》一書中，講述香港的軍事歷史背景之時，即採用此說法：

「香港成為英國屬地時，只是個毫無價值的無人島，但它在華南商貿路線的戰略位置卻不可置疑。在英國統治和法

9 奧林西對香港戰役的研究是個例外。見Lindsay（2005）。

律下，它迅速變成獨當一面的商港，以及英國在中國最繁華地區進行商業和軍事活動的基地……。」

「可是，在「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即因其過份進取的弟子（日本）而感到為難，亦因此與美國愈走愈近。正當（1902年開始的）英日同盟可能突然結束之際，陸軍部在1921年提出「無法使香港有效抵抗敵軍進攻」。自此，英國即轉向新加坡，並於1920至1930年代在該地興建巨大而守衛森嚴的海軍基地。由於1922年《華盛頓條約》¹⁰限制各簽約國擴建它們在亞洲的海軍基地（除新加坡外），令新加坡的戰略地位日重，香港則不再重要。」（Vincent, 1981: 6）

就「英國在一次大戰後不重視香港防務」此說法，近年貝爾（Christopher Bell）、費多羅維奇（Kent Fedorowich）等已利用英國的檔案資料作出修正（Bell, 1996; Fedorowich, 2003）。他們指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未能派出大量軍艦長期駐港或加建海防砲臺，但早已把香港視為對日本戰爭的重要基地。從皇家海軍的《遠東戰爭計劃備忘》¹¹可見，如英日爆發戰爭，英國主力艦隊將以香港為前線基地，逐步北上封鎖日本，迫使日本艦隊與之決戰。因此，自1920年代初開始，英國已著手研究如何派遣空軍，潛艇部隊，以及建立陸上防線的可能，英國也曾打算拉攏中、美兩國來保護香港。於1927年啟用的啟德機場且是屬於英國旨在亞洲建立空軍基地的早期戰略部署之一。其後，於1935至1938年間建造的「醉酒灣防線」

10 Washington Treaty.

11 War Memorandum (Eastern).

較諸英國本土的海岸防線還要更早興建（Kwong, 2012）。英國在此期間對香港防務的投入雖不及新加坡，但以面臨無數威脅的英國來說仍算不少。香港所以成為英國總要作出戰略部署的屬地，不只是因為其地理位置或商業價值，更因為香港可成為英國進攻日本的基地，故不得不加以保護。

然而，「英國放棄香港」一說仍舊長期流行及持續延伸。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來自中國大陸的著作最為力陳英國及香港政府在1941年日軍攻港之前疏於防範，亦不容中國在港進行抗日宣傳，無心守護香港。於《香港史略》中，元邦建對這段時期的描述可說最具代表性，也為其他大陸著作引用：

「香港的英國當局，（和日軍）恰恰正好相反，他們對於日軍存有很大的幻想。誠然，這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有關當局綏靖主義的慕尼黑妥協方針，有著很必然的關係。英國對於日本一直採取妥協讓步政策，仍然想繼續保持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因此，他們在香港嚴格檢查中文報紙。限制和禁止抗日的言論，而對於日僑以及日軍第五縱隊的活動放任自由，根本不加干涉，使日軍在攻佔香港前就已掌握了香港的軍隊和佈防詳細資料。英國當局一廂情願，幻想以此去討好日本，而將戰爭禍水引進中國內地，希望繼續保有香港利益而不受侵犯。1938年4月，英國皇家防衛委員會（似指『帝國國防委員會』）就建議將香港的防衛力量削減一半。英國首相邱吉爾也表示要將香港的防衛力量削減至一個『適當的程度』。」（元邦建，1987：167）

以檔案資料而言，元氏此說並無實據，亦把邱吉爾的言論斷章取義，抽離原有的背景。首先，香港在1938年底廣州淪陷之前，一直都充當中國抗戰與外界連線的主要窗口，倫敦和港府雖面臨日本壓力，但仍容許國民政府利用香港輸入軍事物資，並非單純「一直採取妥協讓步政策」（Bell, 2003；王正華, 2000）。1938年，由於日軍佔領廣州，令香港陸上邊境備受威脅，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確曾建議調整香港防衛政策並獲採納，決定放棄在九龍和新界作長期抵抗，駐軍要以港島為中心，但無所謂「皇家防衛委員會建議將香港的防衛力量削減一半」之說¹²。文中提及邱吉爾的言論來自1941年1月7日，由邱吉爾發出著名的「全錯」電報。當時，他拒絕英國遠東三軍司令（C-in-C Far East）樸芳空軍上將（Air Chief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ham）增援香港的請求。從解密檔案可見，邱吉爾寫道：

「這是全錯（This is all wrong）……如日本打算開戰，則我們根本不能守住香港或替它解圍。增加我們將要承受的損失非常不智。與其增加駐軍，倒不如將其減至象徵式人數。在此發生的麻煩必須等到戰後和會才可解決。我們必須避免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守不住的地方……我希望我們在那裡（香港）有更少部隊，但稍為調動則既顯眼又危險。」¹³

此電發出之時，正值英國與德、意兩國全面交戰、本土面臨入侵威脅的危難關頭，英國當然無力援港。至於「英國當局一廂

12 “The Policy for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5/7/1938, COS 740.

13 “Copy of a Minute dated 7th January, 1941,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to Major General Ismay,” 7/1/1941, COS (41) 28, p. 2.

情願，幻想以此去討好日本，而將戰爭禍水引進中國內地，希望繼續保有香港利益而不受侵犯」一說，亦有誤導成份。英國方面的意向是先解決歐洲，然後再處理日本，又認為中國不能獨力擊敗日本。因此，其戰略計畫其實包含最終跟日本交鋒的部份。1941年6月底，陸軍總參謀長（Chief of Imperial General Staff）迪約翰上將（General John Dill）評論中英軍事合作時，亦曾明言「我們不能根據中國短期的戰術需要作出任何決定」而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全盤戰爭計劃」，因為「中國的未來仰賴我們擊敗日本」。¹⁴

1941年春，德軍放棄進攻英國本土，地中海戰況好轉，美國對日態度轉趨強硬並在菲律賓增兵。英國即逐步加強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屬地的防禦，故決定邀請加國增援香港，藉此增強軍事聲勢，提升中國抗日的信心。故此，同年9月，英國請求加拿大派兵到港，以充實亞洲防務。這並不是「突然」之舉，或如卡爾文森所謂英國全心利用加國士兵充當犧牲品。反而，1941年9月8日，參謀長委員會曾向邱吉爾作如此陳述：

「賈乃錫少將（Major General Arthur Grasett, 1941年7月離任的駐港英軍司令）重提派兵援港，並提到加拿大政府可能承諾派兵。……如果一年前派出援兵，將是錯誤投資，但形勢已經有變。……而且，援軍可向蔣介石顯示我們打算在香港戰鬥到底（fight it out at Hong Kong），對日本亦將有所影響。閣下應當記得我們在1941年1月曾檢討此事，當時我們否決了增援的建議。可是，此後形勢有變，日本近來更對英、美示弱（日本開始和美國談判）。」

14 “Assistance to China: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Imperial General Staff,” 26/6/1941, COS (41) 401, pp. 1-2.

「最近，美國對亞洲興趣大增，並向菲律賓派出援軍。加拿大派兵，將使我們與美國步調一致。加國為帝國國防負上更大責任，貢獻與澳洲增援馬來亞不相伯仲。」

「鑒於以上原因，我們建議派遣最多兩營援軍到港。如首相同意，則政府可以向麥根慈先生（加拿大首相 William Mackenzie King）探探口風。」¹⁵

由此觀之，所謂「英國早已知道香港不能防守，但仍然要求加拿大派兵」一說忽略了英國政府內部在1941年夏秋之交，對亞洲軍事形勢判斷的轉變。透過這些檔案資料，我們反而可以重新認識香港在不同時段面對的軍事形勢變遷，在防衛問題上的相關調整，以及香港在世界大戰之時，於中、英、美、日關係和亞洲局勢中的重要戰略位置。

15 “Annex of COS (41) 559 dated 8 September, 1941,” 8/9/1941, CO 968/13/2.

三. 單一史料與歷史偏見： 劉美美與邱吉爾

香港軍事史研究的另一常見不足就是沒有恪遵「孤證不立」的基本史學法則，因而使其記述可能出現根本誤差。現舉兩例試作說明。第一例為戰前轟動一時的「劉美美案」。劉美美（Mimi Lau），原名劉金玲，是1930年代末至1941年間，頗為活躍於英人和華人精英社交圈子的交際花。1941年，劉美美任職捷和鋼鐵廠東主鄭植之的書記。當時，由於日軍已佔廣州，其空軍勢將使用白雲機場攻擊香港，香港政府遂於同年興建大量防空洞，並訓練防空救護員（Air Raid Precaution Warden）充實民防。有關工程和準備工作均由1937年成立的防空署（Air Raid Precaution Department）負責，其總監為退休空軍中校史柏堅（A. H. S. Steele-Perkins）。該署權力頗大，既可越過正常程序辦事，香港政府亦對它無甚監察。

1941年中，防空署爆出貪污醜聞，導致兩名工務局英籍工程師自殺，一死一傷。同年9月，政府成立由副按察司祁樂壽（Paul Cressall）負責的委員會調查防空署工作，發現外判工程及採購過程出現可疑情況。最矚目者包括政府以較高價錢自捷和鋼鐵廠購入鋼盔、鐵鏟等用品，從生利公司買入劣質空心磚（breeze block），以及投標者竟以空殼公司投得政府合約，

然後外判予其他公司，騙取政府保證的利潤收益。由於防空署未能解釋其他投標者何以沒有以較低價錢中標，因此上述公司均有舞弊嫌疑（Endacott, 1978: 48-52）。雖然自1939年起，香港的中英文報紙均須接受政府審查，但正如蔡榮芳(2001)所言，當時「香港報紙『本港新聞』篇幅，時常為劉美美的法庭記錄所佔滿」（231）。從當時的中文報紙（如《大公報》）所作的詳細記載可見，祁樂壽委員會調查此事期間，劉美美要被傳召作供，問及她與其顧主捷和鋼鐵廠東主鄭植之和防空總監史柏堅的關係及其收入等問題。委員會發現劉美美收到史柏堅的大量禮物，她亦無法解釋其微薄收入何以能夠擁有大量存款¹⁶。

可是，《德臣西報》（China Mail）等英文報紙卻側重報導劉美美和史柏堅的「不尋常關係」。既將劉女的聆訊內容置於報章當眼位置，亦把事件焦點由政府部門貪污轉向桃色細節，藉此有意無意說明政府購入空心磚及出現舞弊原因在於美色引誘¹⁷。其時史柏堅將被調往印度，劉女則為無足輕重的小角色，兩人成為代罪羔羊，實可助淡化事件。結果，「劉美美以美色引誘史柏堅購入空心磚」一說往後成為英人內部廣泛接受的說法。根據被日軍拘留在港的英人回憶，戰爭期間，甚至有被拘英人直稱空心磚為「劉美美磚」（“Mimi Laus”）（Alden, 2001: 135；Wright-Nooth, 1994: 15）。戰後，首先提到此事者為史家英定國（George Endacott）。可是，英氏只引用英文報紙作為參照，兼而直接採納了港府及英人對事件的講法：「有一公司被懷疑利用其女員工與防空總監的友好關係投得政府合約；該公司與另外兩家公司以高價製造空心磚……事件導致這些磚頭以該女子

16 《大公報》，1941年9月5日。

17 *China Mail*, 4/9/1941.

命名」(Endacott, 1978: 52)。英氏所作的此一歷史書寫亦影響其後如莫里斯(Jan Morris)等研究者，使此說成為主流歷史論述的部份(Morris, 2007: 225)。可是，只要小心查閱中英文報紙的內容，即可發現劉美美只與捷和鋼鐵廠高價中標有關，與空心磚一事並無關係。空心磚一事反而與政府工務局人員疏忽檢查，甚至可能收受利益有關，但中英報紙雖然大量報道劉美美與史柏堅的緋聞，卻未有詳細討論政府在空心磚一事中的責任。當時英人選擇相信政府對「劉美美案」的論述，除了媒體誤導之外，或多或少是出於英人作為當權者不願承認錯誤而把責任歸咎於華人，以及對亞洲女性的獵奇心態。

當祁樂壽委員會還在撰寫調查報告之時，《大公報》曾於1941年10月18日報道政府準備成立「懲治貪污局」(Anti-Corruption Bureau)，顯示剛於9月上任的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亦瞭解到必須處理政府貪污問題¹⁸。直至11月16日，距離戰爭爆發只有三周，《大公報》頭版又見出現「公務員舞弊調查委員會」通告一則：

「通告事 茲定於日間開始舉行秘密調查並聽取證供 各界人士如有任何情報可助本委員會進行者 仰即繕函通知本委員會秘書彭德先生(K. M. A. Barnett, 即Kenneth Barnett, 戰後官拜新界民政署長) 函面書明由香港高等法院轉交 合行通告 俾眾周知 此告。」¹⁹

可是，由於日軍攻港，專門查辦香港公務員貪污的官方機構最終延至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始見問世。但英定國討論「劉

18 《大公報》，1941年10月18日。

19 《大公報》，1941年11月16日。

美美案」時，只提到由副按察司祁樂壽撰寫的報告在日治時期「失蹤了」，亦無提及「公務員舞弊調查委員會」一事（Endacott, 1978: 52）。

另一例子則屬於一起更為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香港淪陷後，中國國軍186師師長曾聲稱國軍本已受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指示負責救援香港，準備進入新界解圍，但由於邱吉爾擔心國軍進入屬於租借地的新界會節外生枝，故命令守軍提早投降。此事首先為謝永光的《香港戰後風雲錄》（1996年）所提及：

「香港之戰爆發後，在英國增援無望，日寇節節進逼的情況下，中國居民殷切盼望中國軍隊能解香港之圍……。可惜當中國援軍開到樟木頭附近之際，香港英軍已向日方投降。」

「前國民黨軍隊186師師長張澤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軍救援香港之回憶》一文指出，在抗戰勝利後，他在南京與當年救出香港英國高官多人的陳策將軍（香港淪陷時駐港國民黨機構最高負責人）談話中，得知英軍所以投降，是香港總督楊慕琦遵照老謀深算的英首相邱吉爾的密諭作出的決定。據說其理由是，香港是根據《南京條約》強佔得來的割讓地，如果在英軍手中交給日軍，英軍有理由在勝利後向日軍索還。九龍租借地（新界）有為期九十九年的租約，勝利後亦可以租約未滿為理由，得索還治轄權。如果港九地區落入中國軍隊之手，則問題不比尋常，受降權將由中國軍隊主持，中國方面可援漢口法租界的例子實行收回。所以邱吉爾後來以同樣理由向美總統提出，日本

投降後在港九地區受降時，應由英軍接收。可見邱吉爾老奸巨滑的政治遠見。」（謝永光，1996：161）

此說的重點明顯在於繼續證明英國在必要時即會「放棄」香港，並暗喻英國對於香港實無道義可言，香港的真正利益只能指望中國²⁰。然而，香港淪陷時，負責救援的國軍前鋒獨立第9旅仍在惠州附近，面前有約一旅團日軍（荒木支隊）負責掩護正在進攻香港的日軍第38師團，第9旅顯然不能衝破日軍封鎖²¹。反觀駐港國民黨機構最高負責人陳策在1941年12月22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九時會（匯）報……渴望之國軍反攻，迄今無確實消息，祇得又命蔡參謀與劍如兄偽報戰報數則：謂國軍之先頭一部已侵入新界與敵在距港廿七公里之地點激戰中，又稱我援港大軍分三路沿0000（原文如此）等地南下，前鋒已在淡水東南，深圳西北與敵激戰中……²²。」 □

其時，駐港英軍20日反攻失敗，對大部份部隊失去控制的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Maj. Gen. Christopher Maltby）和港督楊慕琦於當日曾急電倫敦稱大勢已去，暗示投降之意²³。可是，莫德庇得到陳策等人的「偽報」，即於22日報告倫敦國軍增援將至，情況已轉樂觀²⁴。與此同時，邱吉爾及陸軍總參謀

20 2012年10月，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接受訪問談及香港「人心回歸」時即以「日軍攻打香港，收取香港人軍餉的英軍在16日內節節敗退，最後向日本投降」為例，說明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未有守護香港之意」。

21 見日軍第23軍關於荒木支隊的作戰計劃。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香港長沙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頁56-63。

22 陳策，〈香港戰突圍日記〉，1/12/1941，陳安國編，《陳策將軍紀念集》（2011），頁255。

23 0521Z/21，21/12/1941，WO 106/2420A。

24 1105Z/22，22/12/1941，WO 106/2420A；陳策，〈香港戰突圍日記〉，頁255。

長布魯克（Gen. Alan Brooke）亦拒絕考慮投降，發電報要求駐港英軍繼續抵抗，「戰至最後」²⁵。因此，莫德庇及港督楊慕琦再作抵抗，直至25日才因為日軍攻入維多利亞城而投降。綜合中、英、日方史料，「邱吉爾命香港提早投降」一說理應有待更多考證，但現已因其政治意涵可以削弱英國的殖民主義而得以在愛國主義的香港歷史編纂中廣為流傳。

四. 軍事宣傳與歷史論述： 「東方直布羅陀」的神話

香港的軍事歷史論述涉及的知識/權力實踐亦不是僅此一例而已。英軍出於種族主義而輕視日本，自以為其亞洲防務足以抵抗日軍，導致1941年至1942年間在香港、馬來亞、新加坡的慘敗，此說法亦非常流行。例如，2008年出版的《珍珠港迷思》一書，論及1941年英、美兩國準備對日戰爭時就有如此記述：

「英國，美國在太平洋的夥伴，一樣依賴類似的種族觀點來判斷日軍實力。英國遠東三軍司令樸芳在1941年秋寫道：『我有機會近距離一窺那些穿著灰色制服的次人種（sub-human specimens）。他們跟我說那是日軍……假如他們代表一般的日本士兵，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智力組成作戰部隊』」（Victor, 2007: 4）。

此文引述樸芳1941年呈交戰時內閣軍事秘書（Military Secretary, War Cabinet）伊士美少將（Maj. Gen. Hastings Ismay）有關香港防務的信件，據而有此推論確是合理。觀乎當年英國官方的宣傳映片，如同年發行的《東方警戒》（Alert in the East），香港竟被稱為「東方直布羅陀」（Gibraltar of the East），亦同樣顯示英國可能過度自信²⁶。可是，作者

26 “Alert in the East,” 9/1941, Imperial War Museum Collection,

翻查現存倫敦大學李德哈特檔案館（Liddell Hart Archive）所藏的樸芳書信，發現樸芳私下所持的態度遠較審慎。在一封寄給航空部常務次官（Permane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ir）史亞瑟（Arthur Street）的信件中，樸芳確有相近行文：「我從鐵絲網看見幾個日軍士兵……對他們的外觀及表面看來的智商頗不以為然」，但他續言：「單憑片面觀察作出任何結論則甚為危險」²⁷。當時，樸芳正向伊士美要求援軍，深知倫敦總會擔心派出更多部隊到香港只會增加損失，遂貶低日軍以隱瞞派兵風險。另一方面，樸芳顯然瞭解日軍不能輕視，因此不斷要求倫敦增兵，並在表面上裝成胸有成竹的樣子，以塑造英國在亞洲實力強大的印象，使中、美願意與之合作並阻嚇日本。以上的態度，從他在1940年剛上任成為英國遠東三軍司令時呈交倫敦的意見書中可見一斑：「英國在這裡的目標是阻止戰爭爆發……。因此必須採取強硬的政策而非綏靖（appeasement）。（態度）不夠強硬在這裡只會被解讀為缺乏實力」²⁸。為求對內拉攏盟邦，對外震懾敵人，樸芳上任伊始，即要求宣傳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協助，誇大英國在亞洲的軍事實力：

「英國在遠東的宣傳機關應該使遠東民眾瞭解英國在西方必將獲勝，而且我們在亞洲仍有驚人（formidable）的防禦力量。我們的目標是令他們和日本人均相信我們的軍事實力比實際中強，而且強得不能挑戰。宣傳部的代表應好好利用所有關於新到部隊、新裝備、巡視、新防區等資料

C01 122.

27 “Brooke-Popham to Street,” 15/1/1941, Brooke-Popham 6/3/3, Liddell-Hart Archive, King College London.

28 “Appreciation by Commander-in-Chief, Far East: Note by Secretary,” 8/12/1940, COS (40) 1023, p. 2.

迷惑 (mystify) 並誤導 (mislead) 潛在敵人，並鼓勵正擔驚受怕 (fearful) 的潛在盟友」²⁹。

樸芳的心理戰略一直被現有的香港軍事史研究所忽略，反而成為他被後世指責的因由³⁰。部份論者且會指出，英國駐港守軍輕視日軍，因而在12月8日被日軍突襲之時，啟德機場的英軍飛機未起飛即被擊毀（蔡榮芳，2001：232）。事實上，根據駐港英軍的《城防日誌》（Fortress War Diary），樸芳在12月6日即命令啟德機場戒備，開戰當日駐港英軍已準備就緒，但奈何香港高射砲火力有限，難以抵擋空襲，駐港飛機又極為殘舊，根本不能抵敵³¹。結果現有的歷史論述就把事件講成「香港被突襲」，意味英國要為自己的種族主義及軍事自大付出代價。

29 C-in-C, Far East, "Propaganda Policy in the Far East," 7/12/1940, COS (40) 1024, p. 1.

30 包括貝爾、費多羅維奇、馬西 (David Marci) 等新近學術著作亦少有提及樸芳的角色。

31 "War Diary," WO 106/2401A, p. 1.

五. 殖民主義與歷史書寫： 三合會與香港防衛戰

香港戰役期間，香港警察亦有協助守軍抗日。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警方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曾一度向三合會求援。與英軍一樣，香港警察亦有歷史著作紀錄他們的事跡。於1982年出版，由當時警務署長韓義理（Robert Henry）作序的《皇家香港警察》就是現有文獻之中一本較為官方的歷史著作。韓氏甚而稱此書為第一本香港警察的「正史」（definitive history）³²。可是，就警察在二次大戰時期跟軍方的合作，以及跟黑社會的瓜葛，這本「正史」所作的歷史書寫明顯存在權力考慮。這些權力考慮包括官方的選擇記憶、政府機構在建構論述過程中彼此之間的分歧、以及殖民統治者的形象維護。這亦足證香港軍事史研究在資料編纂及陳述上的另一知識/權力險阻。

對於二次大戰時期軍方的行動，《皇家香港警察》一書主要是以1942年警方人員在戰俘營撰寫的《警察戰時日誌》（Police War Diary）作為參考資料³³，內容不乏批評軍方干擾他們工作的部份，例如：軍方徵用了大量警方車輛令警方難以運送糧食，甚至企圖命令警察加入作戰。故此，這本所謂「

32 Colin Crisswell and Mike Watson,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 MacMillan, 1982), p. vi.

33 “Hong Kong Police War Diary - 8-25 December 1941,” C0129/592/4, slide 16.

正史」甚為表揚當時的警務處長俞允時（John Pennefather-Evans）能夠「維持警察的獨立性」（Crisswell, 1982: 166-167）。從軍警雙方的史料亦可看出，殖民地政府和軍方之間的連繫頗為薄弱。雖然軍方早於1936年的《防衛計劃》（Defence Scheme）中已有內部治安的處理，警方於戰前亦自製《內部安全計劃》（Internal Security Scheme），但兩者卻是缺乏溝通，直至交戰期間亦然。例如，雖然軍方於12月8日清晨5時已收到戰爭爆發的消息，但警方在上午9時才自港督方面獲悉戰爭開始，其時日機已轟炸啟德機場（Crisswell, 1982: 166）。在英軍的《城防日誌》及其他事後回顧中，警方在戰鬥中亦無甚角色。

然而，現有著作均有提及戰爭期間香港警察和三合會的秘密合作。如孫福林講及戰爭其間的內部防衛部份，即有指出香港警方一度連同在港國民黨，跟香港島的幫會談判，由杜月笙門生張子廉提供「酬金」以換取幫會合作，揪出日本混入香港民間秘密行事的「第五縱隊」（Snow, 2003: 60; Wright-Nooth, 1994: 48-49）。當時，新界和九龍已經失陷，守軍和日軍隔著維多利亞港對峙。12月11日，刑事偵緝處（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CID）處長助理警司修夫頓（F. W. Shaftain）獲悉日軍已收買部份港島黑幫準備發動騷亂，殺害歐籍市民。警務處長俞允時即和修夫頓透過駐港國民黨機構最高負責人陳策之副官余兆麒出面，找五名三合會代表見面，但五人稱其不能代表幫會，只能代為傳話。後經余兆麒及張子廉與該等代表閉門會談後，於當晚再由修夫頓和余、張兩人在西素酒店（Cecil Hotel）與二百多名三合會成員會面。警方雖然

已經準備二萬港元「邀請」幫會合作，但後者還價之高令警方無法籌措，最後要張子廉代為墊資，直到戰後再由政府歸還張氏（Wright-Nooth, 1994: 49）。

《皇家香港警察》一書雖然大量引用警方的《戰時日誌》，對警方在戰爭期間的行動包括維持治安、在九龍與三合會戰鬥、捉拿日僑、分派糧食、救出難民等，均有詳細記載，卻隻字不提香港警察「收買」港島三合會一事（Crisswell, 1982: 161-179）。翻查《戰時日誌》，在12月12日有一條日，稱當晚警務處長俞允時與刑事偵緝處處長助理警司修夫頓曾於辦公室與「五名擁有六萬名會員的三合會代表」開會，使之「投向法治與秩序」，阻止了三合會對歐籍婦孺發動大屠殺³⁴。此段最後一句被人以黑筆刪去，另以鋼筆加上「會議贏得三合會合作」一語。是少數《戰時日誌》中被刪改的部份。

警方願意提及與軍方的衝突，但略去陳策等協助聯絡英方反收買三合會，其原因既與警方本身利益有關（警方負責治安，其論述自然容不下要找三合會「協助」如此丟臉之事，遑論警方向三合會交出「保護費」），亦似乎由於此事足以影響英國殖民統治在香港的認受性。正如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在《華夷雜處》一書指出，英國的殖民者論述強調英國為香港帶來法治和制度，但香港在英國統治下頭四十年（1841-1880）的情況與其論述大相逕庭。其時官商勾結嚴重，貪污隨處可見，警察與黑社會界線模糊、司法對華人不公

34 “Hong Kong Police War Diary - 8-25 December 1941,”
00129/592/4, slide 40.

(Munn, 2009)³⁵。警察為所有在香港生活者每日所見，是殖民統治最直接觸及市民的象徵。雖然戰前香港政府表面上對社會秩序有絕對控制，可是日軍尚未登陸港島，政府竟對擁有數萬會員的幫會束手無策，更要求助於對香港有主權要求的國民政府以及三合會協助維持港島秩序，保護本應由白人男性和殖民地政府保護的白人婦孺。此事足以動搖被視為戰前殖民統治基石的白人優越感，以及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帶來法治和文明這個認受性來源，當然比軍警不和更為敏感，從警方的論述中消失實可預料。

35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結語

本文並不只是為了利用英、美、日等國的檔案資料來補充香港在二次大戰時期的軍事細節，本文還想提出忽視檔案資料可令香港的歷史想像出現根本的誤差。正如呂大樂指出，英國與香港之間存在的「隱蔽性」仍然無法估量（2012：144）。在研究殖民歷史時，掌握英國殖民者的政治盤算與發掘在地經驗同樣重要。雖然香港在亞洲中有其重大的戰略角色，是英、美、日、中四國爭逐的一大軍事據點，可是香港的歷史論述總在認知層面上著眼於經貿或商業發展，使香港的歷史軌跡少有軍事元素。縱有提及，這些軍事史研究往往又是缺乏整體分析或戰略詳情，不但囿於地方層面或個體觀察，甚而在有意無意之間跟現實政治及意識形態混在一起，在資料，選材，編纂，書寫，以至含意上，都以權力考慮先行。因此，重檢殖民時期的香港歷史，找尋新的歷史視線，為後殖民的今天增進更切實自我反省，勢在必行，本文不過是其中一步。

檔案資料

“Copy of a Minute dated 7th January, 1941,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to Major General Ismay,” 7/1/1941, COS (41) 28.

“Assistance to China: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Imperial General Staff,” 26/6/1941, COS (41) 401.

“Annex of COS (41) 559 dated 8 September, 1941,” 8/9/1941, CO 968/13/2.

0521Z/21, 21/12/1941, WO 106/2420A.

1105Z/22, 22/12/1941, WO 106/2420A.

1439A/21, 20/12/1941, WO 106/2420A.

“Alert in the East,” 9/1941, Imperial War Museum Collection, COI 122.

“Brooke-Popham to Street,” 15/1/1941, Brooke-Popham 6/3/3, Liddell-Hart Archive, King College London.

“Hong Kong Police War Diary - 8-25 December 1941,” CO129/592/4.

“Appreciation by Commander-in-Chief, Far East: Note by Secretary,” 8/12/1940, COS (40) 1023.

“War Diary,” WO 106/2401A.

C-in-C, Far East, “Propaganda Policy in the Far East,” 7/12/1940, COS (40) 1024.

參考文獻

《大公報》。1941。11月16日。

《大公報》。1941。10月18日。

《大公報》。1941。9月5日。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71。《香港長沙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

陳安國（編）。2011。《陳策將軍紀念集》。香港：陳安國出版。

元邦建（編）。1987。《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

王正華。2000。「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民國26至30年）」，《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3-439。新店：國史館。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謝永光。1996。《香港戰後風雲錄》。香港：明報。

Alden, Dauril. 2001. Charles R. Boxer: An Uncommon life: Soldier, Historian, Teacher, Collector, Traveller. Macau: Funda□□o Oriente.

Alderson, Gordon. 1972. History of Royal Air Force Kai Tak. Hong Kong: Royal Air Force Kai Tak.

Banham, Tony. 2003.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Bell, Christopher. 1996. ' 'Our Most Exposed Outpost' : Hong Kong and British Far Eastern Strateg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0(1): 61-88.
- Chan, Wai Kwan. 1989.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lass Formation in Hong Kong 1841-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heung, Siu-Keung. 2012. 'Hong Kong: Geo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 Practi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3(3): 1-19.
- China Mail. 1941. September 14.
- Crisswell, Colin & Watson, Mike. 1982.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 Endacott, George. 1978.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dorowich, Kent. 2003. ' 'Cocked Hats and Small, Little Garrisons' : Britain, Canada and the Fall of Hong Kong, 1941,' *Modern Asian Studies*, 37(1): 111-157.
- Harland, Kathleen. 1981. *The Royal Navy in Hong Kong, 1841-1980*. Hong Kong: Royal Navy.
- Kwong, Chi Man. 2012. 'Reconstruct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in Drinker' s Line from Archival Sources,' *Surveying and Built Environment*, 22: 18-35.
- Lindsay, Oliver. 2005.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stage to Fortun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Melson, Peter. 1997. *White Ensign - Red Drago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in Hong Kong, 1841-1997*. Hong Kong: Edinburgh Financial Publishing (Asia).

- Morris, Jan. 2007.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 Munn, Christopher. 2009.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Neiberg, Michael. 2006. 'War and Society,' Matthew Hughes & William Philpott. (eds.), *Modern Military History*, pp. 42-60. London: Palgrave.
- Ngo, Tak-Wing. 1999.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 Rollo, Denis. 1991. *The Guns and Gunne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Gunners' Roll of Hong Kong*.
- Snow, Philip. 2003.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ictor, George. 2007. *The Pearl Harbor Myth: Re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 Vincent, Carl. 1981. *No Reason Why: the Canadian Hong Kong Tragedy: An Examination*. Ontario: Canada's Wings.
- Wang, Zheng. 2012.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Nooth, George. 1994. *Prisoner of the Turnip Heads: Horror, Hunger and Humour in Hong Kong*. London: Leo Cooper.